

夏目漱石小說的譯介在臺灣

廖詩文

本研究主要探討夏目漱石小說在臺灣的譯介與傳播，梳理了臺灣對夏目漱石小說的翻譯歷程與軌跡。研究發現，1949年之後，夏目漱石在臺灣的譯介因《夏目漱石選集》的重印，傳承了中國新文學時期夏目漱石文學的譯介系譜。往後夏目漱石的小說作品在不同時期的學者、翻譯家及文化研究者的譯介下，逐漸開展出臺灣自身對夏目漱石文學的理解。

臺灣對於夏目漱石作品的高度接受與喜愛，主要來自《少爺》、《我是貓》中透露出的輕快灑脫、幽默風趣以及頓智機才，這類在滑稽詼諧之中諷刺社會人生的漱石作品，在臺灣的翻譯文學界中有著顯著的複譯現象。透過本研究的梳理，我們已能對夏目漱石小說在臺灣的譯介、傳播與發展有更具體的掌握與了解。未來的研究者將可針對複譯本的比較研究及夏目漱石小說譯介對臺灣的影響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關鍵詞：夏目漱石、臺灣、文學翻譯

收件：2014年9月7日；修改：2014年10月21日；接受：2014年12月8日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Natsume Soseki's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in Taiwan

Shihwen Liao

This stud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Natsume Soseki's works in Taiwan,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se works (once translated) on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as well as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aiwa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confirm that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translations of Soseki's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begins from the time when Taiwan began to be influenced by China's New Era of Literature. Then, after 1965, Taiwanese readers gradually developed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Soseki's works. All of this author's novels have been fully translated and are available in Taiwan. *Bocchan*, *I Am a Cat*, and other classic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retranslations, which suggests that Natsume Soseki's works are fully accepted and loved in Taiwan. In fact,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how best to translate this author's literary writing for Taiwanese readers is needed.

Keywords: Natsume Soseki, Taiwan, literary translation

Received: September 7, 2014; Revised: October 21, 2014; Accepted: December 8, 2014

壹、前言

翻譯並非縱向型的文化活動，而是橫向的文化交流。翻譯文學的研究，可說是一種探討文本如何移動的研究，同時需要兼顧譯本的生成及其文化的背景。文學研究重視文學作品對文化、國家以及語言向度的思考，翻譯文學本身已是一種橫向文化交流的產物，所以翻譯文學與原作之間是不盡相同的，那麼在橫向的文化交流之中，譯作最後如何表達原作的藝術性、如何掌握原作的正確性，就需通過分析譯者的個性與風格、代表時代讀者意識形態的文學評論家、出版社等要素來加以探討，進而歸結出譯作的歷史性與藝文性。因此，在進行翻譯文學的研究時，首先必須區分譯本的意圖與譯者的意圖，由於譯者的意圖難以推測，所以翻譯文學的研究應著眼於譯作的意圖，避免兩相混淆。同時，也需考量以譯者或出版社為代表的讀者對譯作的期待。

臺灣與日本之間具有特殊的歷史與地緣關係，彼此之間有十分密切的交流，不僅通過日本接受了各式文化元素，在日本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譯介上，也已累積了深厚的基礎。二十世紀臺灣最熟悉並翻譯最多的日本純文學家，當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 (Kawabata Yasunari, 1899-1972)，最家喻戶曉的大眾文學家，則首推《冰點》(1966)的作者三浦綾子 (Miura Ayako, 1922-1999)。然而，在小說作品的譯介方面，則以日本國民作家夏目漱石 (Natsume Soseki, 1867-1916) 的作品最為完整。夏目漱石在十年的創作生涯中，撰寫過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隨筆、紀行遊記、文學論述、俳句、演講集、談話錄等等，¹ 而最受到關

¹ 隨筆散文方面有《金剛草》、《玻璃門內》、《凱貝爾先生》、《剪貼摘錄》、《永日小品》、《長谷川君和我》、《入社之辭》、《單車日記》等。紀行文方面，有《滿韓遊蹤》、《木屑錄》、《七草集》、《觀菊花偶記》、《居移氣說》等。文學論述與評論方面已知有《點頭錄》、《我的個人主義》、《文學評論》、《文藝哲學的基礎》、《文學論》、《對小說〈魏魯音〉的批評》、《漫談文壇平等主義代表華德惠特曼的詩》等。演講集有《社會與個人》、《朝日演講集》，而談話錄則出版過《博士問題》與《遺傳趣談》等。

注的是他的小說作品，約計23冊，² 這些作品在臺灣幾乎都已有漢譯本的流通與出版，臺灣對夏目漱石小說的譯介已經相當完整。

為梳理夏目漱石小說作品在臺灣的翻譯脈絡與傳播過程，本研究將從夏目漱石小說在臺灣的譯本生成與歷史軌跡，以及主要作品的複譯現象進行探討。在研究方法上，將採歷時性的角度來進行，釐清夏目漱石小說的翻譯在時間變遷中產生哪些變化，觀察不同歷史階段的譯者是否會隨著時代轉變，而對不同讀者需求提出相關回應。在時間區分上，將從魯迅與周作人對夏目漱石的譯介著手，回顧並審視1949年前臺灣與大陸兩地對夏目漱石作品的譯介與看法，進而梳理1949年之後臺灣在夏目漱石文學譯介上如何自成翻譯體系，促進臺灣對夏目漱石作品的認識與理解。

貳、1949年之前

回顧日本近現代文學的漢譯研究，學界普遍認為日本近代翻譯文學的發軔始於周作人及魯迅等中國留日學生的譯介，夏目漱石作品的漢譯亦然。周作人於1923年編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收錄了三十篇日本短篇小說，介紹了15位日本作家，其中夏目漱石的兩篇短篇小說《掛幅》與《克萊喀先生》乃由魯迅翻譯，但是夏目漱石文學在中國的介紹，還可再上溯到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演講〈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時起，因為周作人在演講時已為在場的聽眾談

² 包括《我是貓》（『我輩は猫である』）、《倫敦塔》（『倫敦塔』）、《卡萊爾博物館》（『カーライル博物館』）、《幻影之盾》（『幻影の盾』）、《琴音幻聽》（『琴のそら音』）、《一夜》（『一夜』）、《蘿露行》（『蘿露行』）、《趣味的遺傳》（『趣味の遺伝』）、《少爺》（又譯為《哥兒》）（『坊ちゃん』）、《草枕》（又譯《旅宿》）（『草枕』）、《二百十日》（『二百十日』）、《野分》（『野分』）、《虞美人草》（『虞美人草』）、《礦工》（『坑夫』）、《夢十夜》（『夢十夜』）、《三四郎》（『三四郎』）、《以後》（又譯為《從此之後》）（『それから』）、《門》（『門』）、《彼岸過後》（『彼岸過迄』）、《行人》（『行人』）、《心》（『こゝろ』）、《道草》（『道草』）、《明暗》（『明暗』）等。

及夏目漱石的文學了（王成，2004，頁25）。周作人編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1933、1934年時還曾出過國難後一版及國難後二版，自1923年起的十餘年內，至少出過六版以上，³這意味著民初中國對日本近現代文學家的文學內容與表現形式甚感興趣。

繼周作人與魯迅之後，1929年崔萬秋翻譯了夏目漱石的《草枕》。《草枕》又被稱為「俳句式小說」，是夏目漱石為了傳達「美感」的概念所寫的文學作品。⁴《草枕》素以文體華麗著稱，具有特殊的文學技法，因此不僅在日本備受推崇，在中國譯者之間也相當受到喜愛。除了崔萬秋翻譯過此書之外，1941年上海益智書店也出版過李君猛的複譯本，1956年豐子愷也對此書進行重譯，並將書名名目譯為《旅宿》。⁵除了崔萬秋、李君猛、豐子愷之外，1930年代還曾出現過假「郭沫若譯」之名印製的兩個《草枕》版本，⁶但據王向遠（2001）的考證，此二「郭沫若譯本」實為崔萬秋譯本的盜版，可見夏目漱石這部以「美」的表現為主題，「全篇充滿濃厚東方禪宗哲學與老莊思想」（王向遠，2001，頁89）的作品，在1930、1940年代的中國文學界已是洛陽紙貴，受到高度評價。

回首1920、1930年代的中國，當時時興的是以白話文翻譯與寫作，並藉由白話文的推廣，連結到當時的新文學運動。因此，1932年時，崔萬秋在翻譯《草枕》時選用白話語體翻譯，可說是受到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從後設的角度來看，崔萬秋在《草枕》的翻譯技法上是很強的實驗性的。但是，夏目漱石《草枕》的特色在於「美感」的呈現，文學技

³ 至少已知有1923年的出版、1923年的再版、1925年的三版；1930年王雲五主編的出版、1933年的國難後一版、1934年的國難後二版。

⁴ 戰前翻譯過夏目漱石作品的，除了魯迅、崔萬秋與章克標外，1930年上海美麗書店出版的《草枕》，署名為郭沫若譯，但是根據王向遠的考據，郭沫若並未譯過此書；另於1942年長春益智書店出版的《草枕》，可能是1941年上海益智書店出版的增訂版，署名為李君猛譯述。

⁵ 李君猛的複譯本，根據國家圖書館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的編目資料，為1942年出版，由李君猛譯述。

⁶ 此二譯本都出版於1930年的上海出版社。一為美麗書店，一為華麗書店。兩書譯者都署名郭沫若譯，書名條目都譯為《草枕》，根據王向遠的查證，此二書內容與崔萬秋的譯本相同，應為盜版。

巧的價值顯然高於其所要表達的內容，而白話文體的優點在於能夠平易近人地傳達文學的內容，而非在俳句文學的形式轉譯或技巧再現上，這也是李君猛、豐子愷於1940、1950年代分別試圖重譯這部作品的主要背景，《草枕》複譯本的相繼出現，反映出中國文學翻譯家們的挑戰精神，他們都想以不同文體來重新表現夏目漱石作品中的文學性與文藝性。

1932年，章克標出版了《夏目漱石集》，這部文集選譯了《哥兒》（現在臺灣大多譯為《少爺》，即『坊ちゃん』）、《倫敦塔》、《雞頭序》三篇不同文類的作品。《哥兒》是篇中篇小說，內容詼諧滑稽，是夏目漱石透過小說諷刺社會人生的文學著作。除了《哥兒》之外，夏目漱石以這種文學風格創作的另一作品，則是家喻戶曉的《我是貓》。夏目漱石早期雖以俳諧在日本文壇小有名氣，但真正一夕成名，則是在1905年出版《我是貓》之後。然而，1949年之前除了《哥兒》之外，包括《我是貓》在內，夏目漱石多部著名的中長篇小說如《心》、《虞美人草》、《以後》等都無漢譯，周作人於北大講學時，雖曾在課堂中講述過兩次《我是貓》，但他並未著手翻譯這部作品（周作人，1982，頁529）。除了前述的短篇小品及《草枕》、《哥兒》外，張我軍於1931年翻譯了夏目漱石的《文學論》，1934年丘曉滄在《現代日本短篇傑作集》中則譯了夏目漱石的《文鳥》。其後，崔萬秋於1935年翻譯了夏目漱石剖析人性心理的名著《三四郎》，讓中文讀者有緣閱讀到夏目漱石另外一種小說風格。

反觀臺灣方面，1895到1949年之間，臺灣處於日治時期，當時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文學交流，也因政治因素而不同於魯迅、周作人等中國留學生與日本之間的往來。根據吳文星教授對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相關研究可知，日治開始不久，即有台人赴日留學，⁷直到1902年（該年也是魯迅赴日留學那年），東京地區的臺灣留學生已有30餘人，1910年則

⁷ 1895年12月周福全已前往明治學院普通科就讀。

成長到132人，在1916年夏目漱石因病過世前，臺灣的留日學生已有325人，並都為富豪子弟。⁸ 1915年赴日就讀高等教育的臺灣留學生約有40人，⁹ 這些臺灣的留日學生可以直接透過《朝日新聞》的連載或日文單行本來閱讀夏目漱石的作品。至於臺灣本島方面，若據鍾肇政（1999）在《我是貓》的導讀中所言，可知1938年前後已有夏目漱石《少爺》文庫本的傳播，至於這段期間臺灣是否已有中文譯本，由於目前並無相關資料，仍舊難以定論。

日治時期的臺灣留學生雖有中日互譯的多語能力，但是當時赴日接受高等教育的臺灣子弟主要以習醫為目標，而且日治時期的日本文學屬「國語」教育的範疇，在那時並無將日文譯成漢文來增進文化理解的需要，亦即當時並無將夏目漱石文學翻譯成中文的特殊助緣存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臺灣子弟之中也有前往大陸留學者，根據吳文星教授的研究，1920年代以後，臺灣子弟留學中國似乎漸成風氣，留學地也集中在包含上海在內的幾處學校（吳文星，日期不詳），這也為臺灣留中學生是否讀過中國翻譯家翻譯的夏目漱石漢譯本之考察留下了伏筆，惟目前並無相關資料可考。

綜上所述，1949年之前，夏目漱石的少數作品雖在中國已有漢譯，但這些譯本對臺灣讀者來說，並無直接流通的助緣。1920年代之後，中國翻譯家們雖然積極譯介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作品也受到周作人、魯迅等名家的極力推崇，但對日治時期臺灣的知識份子來說，若要認識夏目漱石的文學世界，並不需要特別通過漢語的轉譯，直接閱讀日文原文即可。這也意味著1949年之前，中日文學交流與台日文學交流在發展歷程上有著不同的脈絡，這是歷史變因與政治變因使然。

⁸ 此為1915年的統計數字。參閱吳文星（日期不詳），頁10。

⁹ 1918年前，臺灣留日學生多是前往日本就讀初等及中等教育，但每年平均約有八分之一的留日學生是前往就讀高等教育。參閱吳文星（日期不詳），頁10。

參、1949年之後

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臺灣並無日本文學的翻譯活動，政治因素影響了日本文學在臺灣的譯介。1960年代之後，臺灣的文藝期刊與報章雜誌開始零星地翻譯芥川龍之介等日本作家的短篇小說，而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譯則可追溯到1965年英紹唐教授編譯的《文鳥、夢十夜》一書。《文鳥、夢十夜》是英紹唐教授編撰的大專日語教材，由臺灣大學出版，內容涵蓋夏目漱石的《文鳥》、《夢十夜》的第一夜、第七夜以及第十夜、橫光利一的《蠅》、井伏鱒二的《鯉》、國木田獨步的《窮死》，以及芥川龍之介的《藪の中》。本書雖以夏目漱石的《文鳥、夢十夜》為題，卻是為了名著選讀課程編寫的日文教材，每篇作品都有中日對照及用語解析，並僅限於大專學生使用，未推廣流通。嚴格說來，此書並非夏目漱石的翻譯作品集，因此臺灣最早的夏目漱石翻譯作品集，當推1967年由臺南開山書店發行的《夏目漱石選集》。

這部「選集」，內容包含了一篇譯者導讀及三篇不同文類的短篇譯作，依序分別為《哥兒》、《倫敦塔》，及《雞頭序》。這本《夏目漱石選集》的譯者雖然載記為「張克明」，但是從內容上看，卻是「章克標」翻譯的《夏目漱石集》的重印本。張健教授（1968）曾在〈評介夏目漱石選集〉一文中表示，這書「想來不是最近的譯品，不知為何不保留原譯者」（頁268），事實上理由早已不言可喻。仔細閱讀《夏目漱石選集》的譯者序，可見到文中載有如下內容，「譯此書的起因，是由於好友方君的不著稱揚此書，他說曾因讀此書而下淚，因為想到將來也有做教師的這一種命運。」（張克明，1967，頁10）這裡提及的「方君」，就是章克標在《夏目漱石集》中提到的方光濤。臺南開山書店當時出版《夏目漱石選集》時，將譯者章克標改為張克明，顯然是要刻意隱匿原譯者及譯者好友之名，這是受到當時國共兩立的政治因素所影響。雖然臺灣的文評家認為《夏目漱石選集》只有「三篇性質各異的作

品外加一篇作者簡介（計十頁），在份量上是寒儉了些。」（張健，1968，頁264），但是此書卻是1949年之後臺灣出版的第一本夏目漱石文選，具有象徵性的意義，這部作品的重印，可說是開啟了夏目漱石文學作品在臺灣的翻譯、傳播與研究之門，也由此承接了民初新文學時期知識分子對日本作家作品的研究系譜，並繼而展開往後五十年臺灣在譯介日本文學作品方面的新氣象。

由於章克標在翻譯夏目漱石的作品時，是在參酌「《漱石全集》中的本篇及毛利八十郎的英譯本」（張克明譯，頁10）來進行翻譯的，因此1960年代後期臺灣知識界與文學界所閱讀的中文譯本，其實是1930年代帶有部分轉譯性質的譯作，在翻譯技巧與文字表現上，也與1960年代之後臺灣翻譯家使用的翻譯語言略有不同。1960年代之後，臺灣的日本文學漢譯主力，主要是在日治時期受過日語教育的作家與翻譯家，以及自大陸遷臺且精通日語的駐外記者，如劉慕沙、朱佩蘭、鍾肇政、黃玉燕、司馬桑敦、余阿勳、金仲達等。

繼《夏目漱石選集》之後，純文學出版社於1970年出版了《少爺》一書，此書收錄了夏目漱石的《少爺》、《琴音幻聽》（『琴のそら音』）以及《玻璃門裡》（『硝子戸の中』）三篇譯文，各篇文後都附有譯者金仲達的導讀與評介，內容觸及作品的時代背景及作者的藝術成就。與前述的其他譯本相較，這本譯本方可說是1949年後臺灣譯者新譯的第一本漱石文選。

金仲達，本名金琦，是《聯合報》早期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本名王光逖，1918—1981）之妻。她在就讀長春大學時期，就以金仲達之名發表文章筆閥時局。1948年金仲達與王光逖結婚後，於1954年隨夫赴日工作，此後常駐日本二十多年。1970年翻譯的《少爺》，在往後的幾十年內至少再版了八次。這意味著夏目漱石在出版界及知識界的心中，並未因為時代變遷而褪色，仍是值得介紹給臺灣讀者的文學家；而《少爺》能夠多次再版，則意味臺灣讀者十分喜愛《少爺》這類在滑稽諧謔

之中，卻帶有諷刺社會人生的文學題材。夏目漱石在《少爺》中高舉理想的旗幟，替天行道，描寫不正不德之人受到制裁等情節，顯然為臺灣讀者帶來淋漓痛快的閱讀樂趣。

繼《少爺》之後，夏目漱石第二部在臺灣被翻譯成中文的中長篇作品，則是1981年遠景出版社出版、李永熾教授翻譯的《我是貓》。《我是貓》是夏目漱石早期的作品，周作人（1982）認為夏目漱石早期的文學作品結合了「英國紳士的幽默與江戶子的灑脫」（頁528），這種寫作風格在《我是貓》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我是貓》在內容方面描寫了日本的學生生活及社會，讀者可以透過翻譯的閱讀，增加對日本及日本文學的見識。這部作品在1981年由李永熾翻譯出來後，在臺灣持續長銷，而且帶動了往後出版界對夏目漱石文學的譯介風潮。以《我是貓》來說，目前臺灣現存的譯本已有七種，譯者多集中於1980、1990年代翻譯此書。除了李永熾的《我是貓》，還有1986年星光出版社出版的趙慧瑾譯本、1989年的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本、2001年卡絜的譯本、2002年逍遙師傅的譯本，1998年與2001年臺灣出版社還引進大陸譯者尤炳圻、胡雪的譯本及劉振瀛的譯本。從夏目漱石《我是貓》的複譯本大量出版於1980、1990年代的臺灣來看，可以了解臺灣讀者對作品中充滿詼諧、諷刺的文風愛不釋手，出版社也注意到《我是貓》在臺灣的讀者市場，紛紛找來翻譯家翻譯，盼能取得商機。這裡透露出臺灣對於夏目漱石文學作品的譯者從早期的學者、出版家、知識人，逐漸交棒到新生代的文字工作者、文學翻譯家之手。臺灣的出版業也從過去以純文學出版社為代表的知識導向、文學導向的出版方針，轉往市場導向、商業導向靠近，在日本文學的翻譯選書上逐漸顯現出商業化的特色，服膺讀者需求與期待。

在1980、1990年代文學商業化的背景之下，臺灣文學翻譯書籍的出版者，對翻譯市場上的「暢銷作家」作品反應敏銳、譯介迅速。夏目漱石這位早在1970年代臺灣讀者心中占居世界作家地位的日本作家，到了

1980年代更成為出版界心中的「暢銷作家」。出版社搶譯「暢銷作家」作品的現象，雖有明顯的商業氣息，但也還是有些優點，那就是作家作品得以在短時間內密集且大量地獲得翻譯。夏目漱石的小說在臺灣得以較全面、較完整地受到譯介，進而成為二十世紀後期臺灣日本翻譯文學界中最暢銷的日本近代文學家，無疑就是拜其所賜。

舉例來說，繼《少爺》、《我是貓》之後，星光出版社於1984年又推出夏目漱石小說的另一新譯《心鏡》，由趙慧瑾翻譯，這也是臺灣第一本『こころ』的漢譯本。這部作品是夏目漱石描寫明治時期的知識份子，在面對自我的內在糾葛與苦惱時，因無法解決這些煩擾而選擇為自我的自由殉死的作品。這部作品不僅是夏目漱石晚期的重要著作，更是描寫自我與社會關係的日本近現代文學中的代表作品。2000年後，陳寶蓮重譯此書，並將書名譯為《心》，似乎更接近夏目漱石的原文題名，而小知堂文化也於2001年出版了陳苑瑜的複譯本。這兩部複譯本出版的時間非常相近，大概是出於一種譯介時間點的偶然所致。

1980年代臺灣在日本文學的譯介策略上，採取的是出版短篇文選來把重要作家及作品介紹給國人的方式，而夏目漱石的小品文及短篇小說也因此受惠而獲得譯介。陳鵬仁於1983年出版《日本近代的作家與作品》，介紹了包括夏目漱石在內的二十位日本作家。楊夢周在1986年也出版了《日本名家小說選》，翻譯了夏目漱石的《十夜夢》與《書信》。李永熾於1987年亦出版《日本掌中小說選》，翻譯了夏目漱石的《喀萊爾博物館》。陳鵬仁、楊夢周、李永熾等編譯者都是學者背景，這也反映出1980年代臺灣在日本文學的譯介上，主要是由學者扮演領航員的現象。

1980年代，臺灣翻譯了不少夏目漱石的中長篇小說。除了《我是貓》、《心鏡》之外，1986年游瑞華翻譯了《從此以後》、1987年陳德文翻譯了《門》。這些作品的出版，逐步開展了臺灣讀者對夏目漱石文學的視野。進入1990年代之後，羅鳳書接著翻譯了《行人》，這是過去

未曾翻譯過的漱石小說，而張蓉蓓翻譯的《夢十夜》，則補足了前人未曾完整翻譯的各夜內容。

臺灣雖於1992年起開始受到國際著作權法的規範，在翻譯日本書刊與版權授權上逐漸自我約束，但是夏目漱石死於1916年，其作品早已超過國際版權對其著作出版的保護期，因此夏目漱石作品在臺灣的翻譯並未受到版權制約的拘束。相較其他必須購買翻譯權的作品來說，譯介夏目漱石等知名而又不需版權的作品，成為這段時期臺灣出版社的最愛，許多出版社紛紛以叢書形式推出日本文學的名著翻譯，石榴紅工作坊即挑選了九部夏目漱石的著名小說合輯出版，並邀請了林水福、李永熾、鍾肇政、黃臨芳等學者、作家撰寫作品導讀，收錄夏目漱石年表及日本學者對夏目漱石作品的解說譯文，是具研究質量並值得典藏的翻譯文學叢書。這套翻譯叢書能夠出版，反映出臺灣對夏目漱石文學作品的高度認同，《草枕》、《二百十日》、《野分》、《曠工》、《行人》等作品都在夏目漱石精選集的出版時獲得推薦。

2000年後，臺灣的出版社曾引進幾本大陸翻譯家翻譯的夏目漱石作品，如吳樹文翻譯的《三四郎》、《後來的事》、《門》等，即便這些作品在臺灣已有不少複譯本，但仍有讀者閱讀與典藏，這個現象反映出臺灣長期存在一群漱石文學的讀者，而且是一代接著一代的。

誠如前述，《少爺》、《我是貓》等夏目漱石的著名小說，在臺灣已有各種不同時代與不同譯者的翻譯版本可供閱覽，然而臺灣的出版社仍舊願意持續出版夏目漱石的作品，這個翻譯現象是非常值得持續關注的。以近期出版的夏目漱石作品來說，2012年麥田出版社出版了茂呂美耶翻譯的《虞美人草》，¹⁰ 2013年大陸的出版社也推出了趙德遠翻譯的

¹⁰ 《虞美人草》的中文譯者茂呂美耶是出生於臺灣高雄的日本人，具有雙母語的背景，學生時代曾赴大陸鄭州大學留學，具有豐富的中日跨國經驗。茂呂美耶靈活的中文寫作能力及日本文化的背景，使她能以活潑且富條理的語言翻譯夏目漱石的作品，並於譯者序中提出文化評述式的導讀，為臺灣讀者提供新的閱讀經驗。

《春分之後》。《春分之後》雖為大陸譯者所譯，目前只有簡體中文版，但已在臺灣流通與傳播，而《虞美人草》則是一部充滿詩意的作品，過去未曾有人翻譯的原因，主要是因其文學語言的難以駕馭，這對譯者而言是極具挑戰性的。2012年《虞美人草》在臺灣譯出，又讓臺灣讀者得以見識到夏目漱石另外一種寫作風格。

綜上所述，臺灣對於夏目漱石作品的高度接受與喜愛，主要來自《少爺》、《我是貓》中透露出的輕快灑脫、幽默風趣以及頓智機才，這類在滑稽詼諧之中諷刺社會人生的漱石作品，在臺灣的翻譯文學界中有著顯著的複譯現象。數十年來，夏目漱石小說的中譯不斷推陳出新，並越來越完備，這意味著臺灣讀者是有在長期追蹤並持續閱讀夏目漱石的文學作品。近年來，在《虞美人草》及《春分之後》的相繼譯出，使得夏目漱石的小說作品在臺灣的傳播，幾乎已全有中文譯本，要說夏目漱石儼然成了臺灣日本翻譯文學界的國民作家，似乎也不為過了。

肆、結語

本研究從歷時的角度，梳理了臺灣對夏目漱石小說的翻譯歷程與軌跡，探討時間變遷對夏目漱石文學在臺灣的譯介現象。研究發現，1949年之後，夏目漱石在臺灣的譯介因《夏目漱石選集》的重印，傳承了中國新文學時期夏目漱石文學的譯介系譜。往後夏目漱石的小說作品在不同時期的學者、翻譯家及文化研究者的譯介下，逐漸開展出臺灣自身對夏目漱石文學的翻譯脈絡。透過本研究的梳理，我們已能對夏目漱石小說在台灣的譯介、傳播與發展有更具體的掌握與了解。未來的研究者將可針對複譯本的比較研究及夏目漱石小說譯介對台灣的影響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參考文獻

- 王成（2004）。夏目漱石作品在中國的翻譯與影響。載於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文學研究室（編），日本文學翻譯論文集（頁57－7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王向遠（2001）。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丘曉滄（選譯）（1934）。現代日本短篇傑作集。上海：大東書局。
- 李永熾（1986）。日本掌中小說集。臺北：圓神出版社。
- 吳文星（無日期）。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頁1－16）。取自<http://asp2005.fy.edu.tw/LiteracyClass/upload/plain1/%E6%AD%B7%E5%8F%B2/%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5%8F%B0%E7%81%A3%E7%9A%84%E6%95%99%E8%82%B2%EF%BC%88%E4%BE%9D%E8%AC%9B%E7%A8%BF%E6%A0%BC%E5%BC%8F%EF%BC%89.doc>
- 英紹唐（1965）。文鳥、夢十夜。臺北：臺灣大學。
- 周作人（1982）。周作人全集3。臺北：藍燈文化。
- 周作人（編譯）（1923）。現代日本小說集。上海：商務印書館。
- 章克標（選譯）（1932）。夏目漱石集。上海：開明書店。
- 郭沫若（1984）。郭沫若專集。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 張克明（選譯）（1967）。夏目漱石選集。臺南：開山書店。
- 張健（1968）。評介「夏目漱石選集」。幼獅文藝，28（1），264-268。
- 楊夢周（1986）。日本名家小說選。臺北：聯合報出版。
- 楊夢周（1988）。日本名家小說集第二輯。臺北：聯經出版。
- 陳鵬仁（1983）。日本的作家與作品。臺北：黎明文化。
- 鍾肇政（1999）。導讀：獨創一格的明治小說——讀夏目漱石的《少爺》。載於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夏目漱石精選輯4少爺（頁2－6）。臺北：萬象出版。

附錄：臺灣出版傳播的夏目漱石作品一覽表

1. 坊ちゃん

1967〈哥兒〉（坊ちゃん），《夏目漱石選集》，夏目漱石原作，張克明譯，臺南：開山書店。

1970《少爺》（坊ちゃん），夏目漱石原作，金仲達譯，臺北：純文學。

1978《少爺》（坊ちゃん），夏目漱石原作，谷瑞珍譯，臺南：王家。

1986《少爺》（坊ちゃん），夏目漱石原作，陳品言譯，臺北：星光。

1989《少爺》（坊ちゃん），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北：久大。

2000《少爺》（坊ちゃん），夏目漱石原作，李孟紅譯，臺北：小知堂。

2001《哥兒》（坊ちゃん），夏目漱石原作，陳德文譯，臺北：志文。

2. 我輩は猫である

1981《我是貓》（我輩は猫である），夏目漱石原作，李永熾譯，臺北：遠景。

1986《我是貓》（我輩は猫である），夏目漱石原作，趙慧瑾譯，臺北：星光。

1989《我是貓》（我輩は猫である），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北：久大。

1998《我是貓》（我輩は猫である），夏目漱石原作，尤炳圻、胡雪譯，臺北：光復。

2001《我是貓》（我輩は猫である），夏目漱石原作，劉振瀛譯，臺

北：志文。

2001《我是貓》（我輩は猫である），夏目漱石原作，卡絜譯，臺北：立村文化。

2002《我是貓》（我輩は猫である），夏目漱石原作，逍遙師父譯，臺北：華城圖書。

3. 夢十夜

1965《文鳥、夢十夜》，夏目漱石原作，英紹唐譯，臺北：臺灣大學。（臺大日語教材）

1986〈十夜夢〉（夢十夜），《日本名家小說選第一輯》，夏目漱石原作，楊夢周譯，臺北：聯合報出版。

1987〈夢〉（夢十夜），《日本掌中小說選》，夏目漱石原作，李永熾譯，臺北：圓神。

1993《夢十夜：日本短篇小說譯介》（夢十夜），夏目漱石原作，張蓉蓓譯，臺北：久大。

2002《夢十夜》（夢十夜），夏目漱石原作，張秋明譯，臺北：一方出版。

2007《夢十夜》（夢十夜），夏目漱石原作，周若珍譯，臺北：小知堂。

4. こゝろ

1984《心鏡》（こゝろ），夏目漱石原作，趙慧瑾譯，臺北：星光。

2000《心》（こゝろ），夏目漱石原作，陳寶蓮譯，臺北：先覺。

2001《心》（こゝろ），夏目漱石原作，陳苑瑜譯，臺北：小知堂。

5. 三四郎

1935《三四郎》（三四郎），夏目漱石原作，崔萬秋譯，上海：中華書局。

1969《三四郎》（三四郎），夏目漱石原作，崔萬秋譯，臺南：開山書店。

2001《三四郎》（三四郎），夏目漱石原作，李孟紅譯，臺北：小知堂。

2001《三四郎：愛情三部曲1》（三四郎），夏目漱石原作，吳樹文譯，臺北：志文。

6. それから

1986《從此以後》（それから），夏目漱石原作，游瑞華譯，臺北：星光。

1989《之後》（それから），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北：久大。

2001《後來的事：愛情三部曲2》（それから），夏目漱石原作，吳樹文譯，臺北：志文。

7. 門

1987《門》（門），夏目漱石原作，陳德文譯，臺北：金楓。

1990《門》（門），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北：久大。

2001《門：愛情三部曲3》（門），夏目漱石原作，吳樹文譯，臺北：志文。

8. 草枕

1929《草枕》（草枕），夏目漱石原作，崔萬秋譯，上海：真美善書店。

1930《草枕》（草枕），夏目漱石原作，郭沫若譯，上海：美麗書店。

1930《草枕》（草枕），夏目漱石原作，郭沫若譯，上海：華麗書店。

1942《草枕》（草枕），夏目漱石原作，李君猛譯述，長春：益智書店。

1987《草枕》（草枕），夏目漱石原作，鄭清文譯，臺北：光復。

1990《草枕》（草枕），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

北：久大。

9. 行人

1993《行人》（行人），夏目漱石原作，羅鳳書譯，臺北：萬象。

1995《行人》（行人），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北：久大。

10. 硝子戸の中

1970《玻璃門裡》（硝子戸の中），夏目漱石原作，金仲達譯，臺北：純文學。

2012《玻璃門內》（硝子戸の中），夏目漱石原作，吳樹文譯，臺北：自由之丘文創。

11. 倫敦塔

1967〈倫敦塔〉（倫敦塔），《夏目漱石選集》，夏目漱石原作，張克明譯，臺南：開山書店。

12. カーライル博物館

1988〈喀萊爾博物館〉（カーライル博物館），《日本名家小說選》，夏目漱石原作，楊夢周譯，臺北：聯合報出版。

13. 琴のそら音

1970〈琴音幻聽〉（琴のそら音），《少爺》，夏目漱石原作，金仲達譯，臺北：純文學。

14. 二百十日

1990《二百十日》（二百十日），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北：久大。

15. 野分

1990《野分》（野分），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北：久大。

16. 虞美人草

2012《虞美人草》（虞美人草），夏目漱石原作，茂呂美耶譯，臺

北：麥田。

17. 坑夫

1990《礦工》（坑夫），夏目漱石原作，石榴紅文字工作坊譯，臺北：久大。

18. 道草

1977《道草》（道草），夏目漱石原作，臺北：驚聲文物。（日文版，無翻譯）

19. 明暗

1989《明暗》（明暗），夏目漱石原作，林懷秋譯，臺北：遠景。

20. 文鳥

1965《文鳥、夢十夜》，夏目漱石原作，英紹唐譯，臺北：臺灣大學。（臺大日語教材）

21. 自轉車日記

2002《單車日記》（自轉車日記），夏目漱石原作，張秋明譯，臺北：一方出版。

22. 手紙

1986〈書信〉（手紙），《日本名家小說選第一輯》，夏目漱石原作，楊夢周譯，臺北：聯合報出版。

23. 高浜虚子著『鷄頭』序

1967〈雞頭序〉（高浜虚子著『鷄頭』序），《夏目漱石選集》，夏目漱石原作，張克明譯，臺南：開山書店。

24. 彼岸過迄

2013《春分之後》（彼岸過迄），夏目漱石原作，趙德遠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